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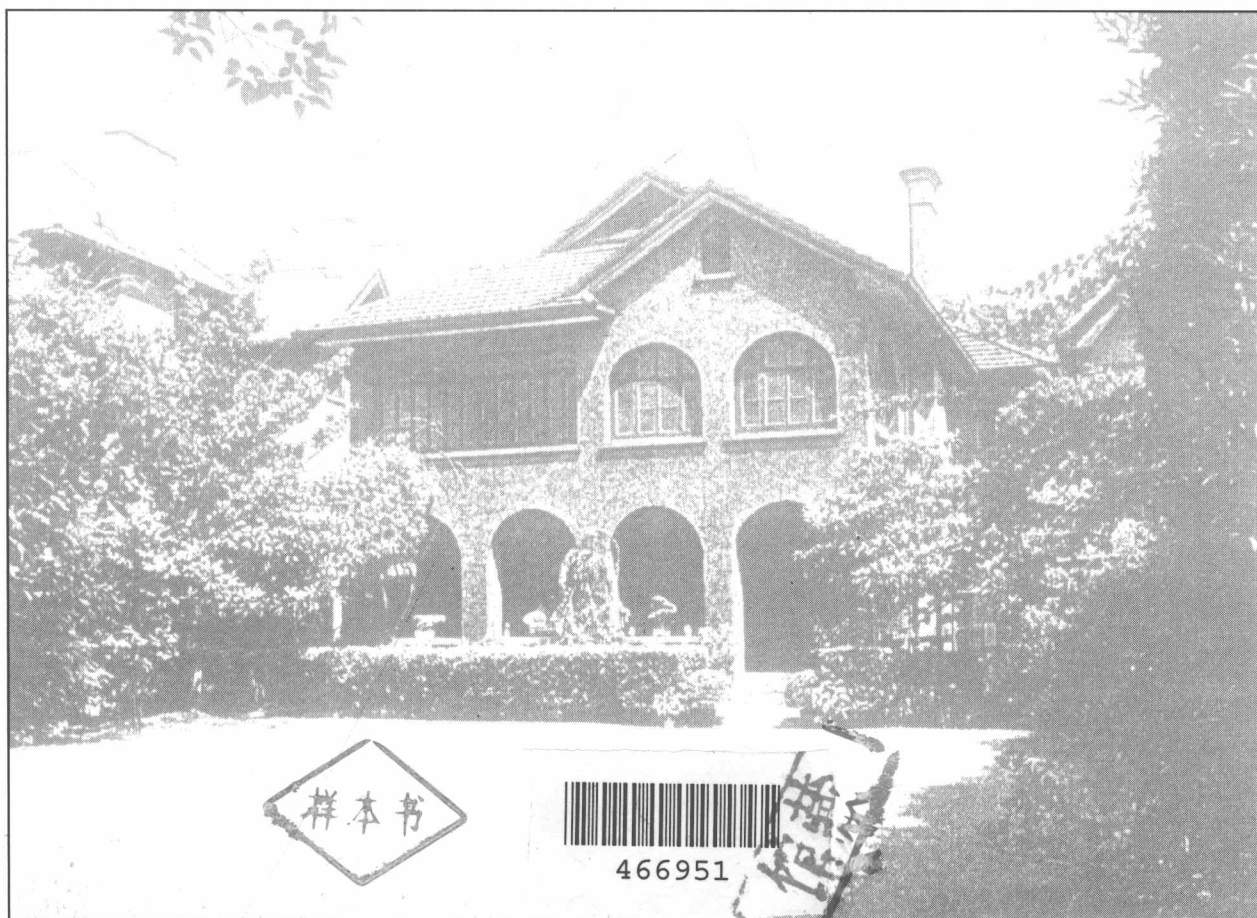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与宋庆龄

466951

孙中山与宋庆龄

主 编 张 磊 萧润君 盛永华(常务)



466951

广东人民出版社

4669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与宋庆龄/张磊等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12

ISBN 7-218-02623-0

I. 孙…

II. 张…

III. ①孙中山—传记—图集②宋庆龄—传记—图集

IV. K827·6-64



孙中山与宋庆龄

主编 张磊 萧润君 盛永华(常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公司印刷

(厂址：深圳市龙岗坂田五和大道)

889×1194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2插页 200,000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18-02623-0/K·617

定价：30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策 划 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顾 问 (按姓氏笔画):

于幼军 叶选平 刘大年 张文彬
陈锡祺 金冲及 胡 绳 黄 华
谢 非 谢明仁

封面题字 赵朴初

主 编 张 磊 萧润君 盛永华 (常务)

责任编辑 陈海烈 辛朝毅

版式设计 兆 猷 冠 隆 孙 永

封面设计 张希广

环衬摄影 吴 刚

责任技编 孔洁贞 黄秉行

责任校对 叶康让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人。乳名帝象，入学时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逸仙，从事革命活动后，用过许多化名，如高野、中山樵等。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

宋庆龄，海南文昌人。又名庆琳，英文名罗沙蒙德（Rosamond）。参加革命后曾化名中山琼英、林泰等。

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学生、伴侣——宋庆龄，宛如黑暗天幕中的一对“双子星”，给灾难深重的民众带来希望、信心和力量，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和慰藉。

正像“北斗”一样，其中的一颗巨星光芒四射，引导人们走出中世纪的牢笼，迎向美好的未来。这颗巨星释放和耗尽了全部能量后，殒落在风雨如磐的故国大地上。

“双子星座”失去了一颗星，但另一颗星依然高悬天际。岁月的流逝使她更为明亮璀璨：既蕴含着已经消失的巨星的光和热，又接受了初升的太阳的强力辐射。这颗星辉耀着民众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激励他们迎接曙光和创造新的生活。

第二颗星经历半个多世纪以后，消逝在祖国春天来临的时刻：然而，这对“双子星”长存于人们的心中：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抑或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进程，不仅未曾淡化他们的光辉，而且导致了更广泛的认同。

他们的英名青史长存！

他们的业绩永垂不朽！

前 言

(一)

伟大的时代，孕育和塑造伟大的人物。

当然，人物总是环境的产物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活动离不开历史的舞台，是以“时势造英雄”。但是，杰出人物大抵又是一定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代表，从而影响了事变的进程，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之“英雄造时势”的论断也反映了这种双向关系的又一侧面。

在堪称发生了“天崩地解”般的“千古未有之变”的 19—20 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两位巨人——孙中山与宋庆龄。他们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宛如深邃天幕中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是时代和民族的精英，对近代中国发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社会从封建末世入于近代时期。然而新阶段的到来既非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亦非因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史剧帷幕的开启，竟然是被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拉动。这种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切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进展过程。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依然严重存在于各个社会领域，因为帝国主义在促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同时竭力保存中世纪的腐朽事物，甚至与之相结合，互为靠山和墙脚。这种极端反动的联盟，严重桎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民主政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作为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持续了 80 年，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样正规的、全国范围的斗争都以悲剧告终，事实证明，殖民地附属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在帝国主义时代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作为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化和拓展，它将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导向光辉的彼岸——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备受压榨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必须继旧

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攀登两个台阶，即实现两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用 28 年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然后，不停顿地为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继续奋斗。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只有社会主义（包括作为它的必要准备的新民主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乃是为实践所检验的颠扑不破的法则。其他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理论和方案，总是难以避免悲剧性的命运。

这就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先进人士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探求、把握和实践。

孙中山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近 40 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战斗历程延伸过两个世纪和贯穿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阶段。他的足迹和活动涵盖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入于近代化。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而又内涵丰富的。他几次环行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人生和价值的真谛；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中固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又能够“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满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他必须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而难免以悲剧告终。他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订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迈进不停，攀登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一直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

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展。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了一个加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弭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建设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在这种意义上，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孙中山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宋庆龄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样，她也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她是以孙中山的战友、学生与伴侣的身份参与、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则是由于她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而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接轨。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群体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导引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甚至她的崇高品格的魅力也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主从之分，但影响却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战友、导师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会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现实的舞台，继续鼓舞人们奋进，以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宋庆龄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共同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宋庆龄与孙中山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和事物急剧变化的年代，跨世纪的峥嵘岁月包含了两个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而前者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重要的歧别。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几乎浓缩了西方几个世纪的社会内涵：往往一次革命运动方才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运动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因此，现实便向站在时代前列指导潮流的人物提出了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及时总结、不断扬弃并自我超越，以便与时俱进。任何停顿便会沦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为激流的障碍。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还须非常注意保持革命新旧阶段的连续性——将前一阶段革命成果在下一阶段加以发展，把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作为下一阶段的借鉴。先前的革命队伍则往往由最有能力、威望和凝聚力的先进人物率领，经过分解整顿后投入新的斗争。这种承绪在很多方面都是必要的，对新阶段的斗争大有裨益。宋庆龄不愧为炽烈的爱国者和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的楷模，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孙中山的忠实的、亲密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时代精神，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显示了不同革命时期和阶段的不可分割的联接性和贯通性：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是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的准备；后来的高级革命阶段，则是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的发展。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们所推进。他的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计划，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联接和贯通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正是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斗争时期。

(二)

孙中山在 19 世纪末叶踏上了社会政治舞台。

他面临着低抑的现实。在西方，1789 年的汹涌澎湃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早已过去，1848 年的不彻底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则告一段落；在东方，60 年代的俄国只能凭借自上而下的农奴解放发展资本主义，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具有渐进的性质。只有 1871 年异军突起的巴黎公社，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日益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甚至不允许温和的社会变革，对戊戌变法进行了血腥镇压。然而，许多殖民地附属国终究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觉醒。而由于“‘新精神’和

“‘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化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中国所有的进步思潮和运动，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这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青年，很早就要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曾经受过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早年经常以“洪秀全自况”，并同许多著名的维新人士相结交，在他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中很明显地留着农民战争和维新思潮的印记。但是，他出身和教养又不同于农民战争领袖和维新志士，使他的思想中蕴蓄着更多的民主主义因素，未曾局囿于先驱者的范畴。1894年夏，他怀着改革的热望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便毅然跨出决定性的步伐，立志实行革命以改造中国。从此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毫无疑义，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前往檀香山，并在这年11月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宣言号召人民奋力“振兴中华”，拯救危亡。入会誓词则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已具雏形的民主革命纲领显然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首次出现的共和国方案。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纲领相较，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更为圆满地回答了历史的课题——它继承了农民战争对封建暴政的不妥协精神，却摒弃了“皇权主义”的陈腐；它接受并发展了维新人士仿效西方、重视社会改革的主张，却排除了“君主立宪”的糟粕。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首次飞跃不仅使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获得了新的内涵，也使他成为亚洲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家。

在兴中会的长达10年的征程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之役虽然流产，却堪称为他的革命的“战争事业”的发端；1900年惠州之役再次失败，但革命党人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令人感奋，显然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孙中山在战斗历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扩大了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并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当革命浪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开始高涨时，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同保皇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大论战，是同盟会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功绩。这场论战围绕着革命与保皇的根本性课题展开，革命党人有力地批驳了保皇党人的各种谬论，“扫除保皇邪说”，发展了三民主义政纲，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为“反满”和力求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民权主义的基本

内容为经由“国民革命”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以建立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使中国臻于繁荣富强。论战以革命民主派的胜利告终，致使它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从而，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政治、思想上的条件。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旗手。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则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的自发斗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其他条件而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人民觉醒，激励群众斗志。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不断扩大的保路风潮，又把斗争推向高峰。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帜。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这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和主持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与宪法等”的《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除旧立新的法令。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的步伐：打倒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政治、思想领域中造成了一次民主主义的启蒙。从此之后，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一幕短命的丑剧！

然而，共和制度的实际生存期非常短暂。反动势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形势的逆转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夺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和毁弃共和制度，乃至公然称帝。在他同他的洪宪残梦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头子们又继承了死去的独夫、民贼的衣钵。民国依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民犹斯也，国犹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当年流传颇广的这副对联，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徒有其表的“民国”和走马灯式更迭的“总统”的鄙视。

孙中山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持续斗争，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有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这些艰苦的战斗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成果，但不能实现共和主义真谛。面对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相对强固的统治，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把共和国方案付诸实现。西方共和制在中国的翻版，只能是形似而非神似，以致在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战斗历程中，几乎每个回合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是在捍卫共和制度遭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孙中山于流亡东京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与宋庆龄会见。他们的始点颇不相同——一位来自濒海的南粤山村；一位诞生

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使得他们得以汇聚。

对于宋庆龄来说，历史在她的生活历程中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把目光投向世界，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趋于近代化，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开放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使她能够在少年时代就漂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认识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洗礼。还在负笈异域的少女时期，宋庆龄就憎恶中世纪的观念和陋习，认为清帝国的统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切望祖国挣脱桎梏而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炽烈的爱国主义成为这位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留学生的思想的主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所有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热望。因之，爱国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事实上，还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掠，中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她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灾难，为祖国遭受到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她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能忍受在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因为她确信只要“唤起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有“真正的进步”。

封建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由是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日渐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更新和进步，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正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她从爱国走向变革。这是合乎逻辑的，具有完全意义的爱国主义应当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激情促进了理性，理性升华了激情。挚爱祖国的山川、历史、文化和人民，必然会奋力探索救亡和富强之路。

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进入了青年时期。迎接她的是剧变的中国和世界。然而，为她满怀激情所称颂的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所攫夺。“二次革命”未能获得广泛的响应，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他的少数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再次流亡日本，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中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宋庆龄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离别五载的祖国，辛亥革命——她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没有如她所期望那样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真正的生机和活力，学成归国后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更是无从施展。宋庆龄只得于1913年夏从美国径直前往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战友和学生。年青的文学士在政治生涯开始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

心”。宋庆龄的政治素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重要的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由于父亲的评述使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更结成为生死不渝的同志和伴侣。

(三)

但是，历史的行程并不因“顿挫”而停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已经趋于终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正在到来。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和领导阶级迈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导致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革命阶段新旧交接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卓识、气魄和胆略。他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使长期以来从事的斗争适应历史的潮流。他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飞跃。

孙中山热烈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就曾致电列宁，表示对他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战斗”。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效果”。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时，他把他们引为忠诚的战友。事实上，孙中山于1921年底在桂林军次就已会见经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马林提出的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进步阶级和阶层的政党，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而当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从广州抵达上海时，刚刚参加了确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方针的中共中央二届二中全会的李大钊便来拜访，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中心内容是“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1923年初，孙中山和廖仲恺同苏俄代表越飞又进行了多次会谈，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宣言”，确定两国密切合作以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原则。此时，讨贼军与滇桂联军逐走了盘踞广州的陈炯明。孙中山便于2月下旬回粤，在穗设立了元帅府。他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与时俱进地赋予三民主义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培训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的买办武装——商团的叛乱，巩固和扩展了广东革命策源地，开创了实行北伐的大好局面。可以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期，孙中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进步性，在新的时代建树了新的业绩，并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在持续的战斗过程中，宋庆龄给他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影响。

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征程，堪称“艰难顿挫”和奋进不已的10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主要是反袁与两次护法运动——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代的大潮俱进。年青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宋庆龄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他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流亡异域，开府广州，颠沛流离，战祸频仍……正是在这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孙中山成为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带领她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奋斗，使她在不断的失败与探索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而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但是，作为学生的宋庆龄，与她的导师孙中山的相互关系并非限于单向，他们之间的作用显然是双向的。在革命濒于低潮和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朝气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她给孙中山的支持和慰藉，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与时俱进的动因之一。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因之，对于中国革命也产生独特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这种作用尤为明显。

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并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大希望”，要“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们自觉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检验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由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新阶段涌起了第一个高潮。

革命形势的迅速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队伍的分化及思想的冲突愈趋激烈。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自同盟会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更替，他的主要助手们往往有所变化。从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始终支持的成员并不很多，而参与革命事业较晚的宋庆龄，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在革命的低潮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从此义无反顾。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方面相互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翼的干

扰。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刻，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日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和决策的形成和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相互扶持及砥砺中，他们应合着时代脉搏走向了更高的革命阶段。

(四)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使得极度悲痛的宋庆龄更为忧虑的，则是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地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的叛变，加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路线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夭折，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攫取了革命的果实。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只是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断言“目前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谴责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断言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丧失了革命性”而“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因为她确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相信“正确地配合运用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这样的国民党才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称号的党派，是唯一忠于他的主义和政策的党派”。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将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继续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走向。